

现

随笔卷

代

走近 —— 神圣

闵惠泉 主编



7.1

传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播

现代传播文丛 主编 朱光烈

随笔卷

走 近 神 圣

主编 闵惠泉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近神圣/闵惠泉主编 . -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7

(现代传播文丛·随笔卷/朱光烈主编)

ISBN 7-81004-898-8

I . 走… II . 闵…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8856 号

现代传播文丛·随笔卷

走近神圣

主 编: 闵惠泉

责任编辑: 陈友军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65779405 或 65779140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SBN 7-81004-898-8/G·537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走向开放

——《现代传播文丛》总序

朱光烈

“后现代观念”

当我把现代传播文丛编定，准备交出版社之时，读到了关于戴维·桑格《现代多米诺骨牌理论指南》一文的报道。桑格说，韩国和日本都生产计算机芯片和汽车，其中一国的货币贬值马上就可以使这些产品在别的国家贱卖，从而使这些国家货币贬值。任何国家的经济崩溃都可以在全世界引起一系列无法控制的事件，这和快速传染病一样，有多种传染形式，市场传染，出口传染，日元传染。市场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很难看出哪是国内政策的终点哪是外交政策的起点。

这真可谓“边界不清”，“多元共生”，这两个词在当下学术刊物中出现频率极高。它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桑格描述的是一种全球化状况。全球化过程开始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时，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资本主义制度使一切国家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共产党宣言》，1848）。

500 年前的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但是，它无论如何无法与今天的全球化相比。上个世纪末的 1897 年英国女王轻轻敲打着摩尔斯电码，向全世界的臣民们发出问候：“谢谢我所钟爱的人们，愿上帝保佑他们”，可以说是 100 年前的通讯全球化，但它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今天的全球移动电话、卫星电视和因特网的全球化状况相比。半个世纪前的 1944 年，44 个国家通过了布雷顿协议，确定了战后国际金融体制，这是那个时代的金融全球化。当下金融危机正在席卷全球，学者们认为这与布雷顿体制不能适应今天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直接相关。经过半个多世纪，美国学者沃尔特·里斯顿认为，国际金融体系已由金本位、美元本位发展到信息本位，在信息本位时代，对国际金融秩序任何政府都难于控制。桑格描述的正是这种状况。世界越来越走上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而此刻我们还看到世界正在实现电脑网络化，并有可能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竞争又相互调适互补发展的空前大变革时代。

福科 60 年代提出了知识型理论，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总关系——知识型。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是“相似”；古典时期的知识型是“代表”，相信科学的精确性；“现代时期”的知识型转入“人的纪元”，“代表”失去了清晰度，人们认识的世界只是一个模糊的语义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社会发展如此之快，前后差别如此之巨，必然带来观念的重大而迅速的变革。历史是联系的，任何一个时代特征（知识型）都可以在以往的历史里找到它的基因、胚胎、萌芽甚至童年，但是以往的历史里这些特征隐而不彰，只有到了这个时代它才浮上水面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到了 60

年代人类开始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而信息无形无质又传播极为迅速，信息的这种特征与物质大不相同，于是，事物之间填平鸿沟、边界不清的特征便凸现于社会生活之中。“边界不清”、“多元共生”作为一种观念，作为一种学术术语也流行了起来。这种观念可不可以称之为后现代观念我不敢说，但是我相信它反映了后现代状况，我这里权且称它为“后现代观念”吧。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遇到旧的社会规则的阻碍，清除路障继续发展的任务是经由精神的转换而完成的，即首先确立反映新发展的新观念，然后在这种新观念的引导下实现社会规则的变革，为发展扫清道路。历史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会有一次大的变革，因此观念的这种反作用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今天社会发展之快早已使人眩目，变革一个接着一个，于是社会发展的观念反作用成了一个几乎不断的链条，观念更新的意义空前重大，一刻都不可离开。中国经过 20 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已经不似从前，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重形态重叠的状况，我们只有站在“后现代”这个前卫立场上，同时又结合中国国情，才可能引导发展。

近 6 年来，《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以下简称《现代传播》）便是在这里说的“后现代观念”影响之下走过来的。

学报的开放

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是不断地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已经或正在走向社会化。学术也是这样，今天的学术已经高度社会化，学术刊物是经常的、效率最

高的、影响最大的学术社会化渠道，它不同于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个人，舍弃了学术活动众多过程，只负责选编、发表表现成的学术成果，轻装上阵，连绵不断，对最新学术成果反映迅速。一家学术刊物观念如果是开放的，它可以面向社会同时汇集发表有关学科、不同观点的学术成果，起着“接触剂”的作用，十分有利于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化合”，从而促进学术研究质的飞跃。在我看来这便是学术刊物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职责。我知道的境外高校办的学术刊物都是完全向社会开放的，本系本校的作者与系外校外作者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发稿的优先权。大陆高校的学报则不然，长期以来以发内稿为主，这种政策是在什么条件下提出的？后来有什么发展？对学报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现在是否应有新的政策？都是值得检讨的问题。

实现学术社会化是学术刊物的社会职责，在我看来，社会事物只有明确而又忠诚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才有生存的理由和发展的可能。《现代传播》近几年来的道路是逐步社会化的道路，发展到近三四年学院内外作者基本一视同仁、以质取稿，这种状况不仅是在上述“后现代观念”影响下发生的，而且也是我们寻求学报的社会位置、履行学报的社会职责、从而为寻求学报发展之路的努力。

学术的整合

《现代传播》又是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学术刊物中的一种。大陆传统的新闻类专业教学科研致力于党的新闻政策和业务的机构内应用研究，已经涌现出一批卓有成绩的人才和优秀成

果。但是随着大众传播事业的迅速发展，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和深刻，成为现代文化最引人注目、最能体现其特征的一部分。新闻与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它的文化意义构成了一个新的、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于是新闻学实现了向传播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社会里，社会信息传播较少，而 60 年代进入信息社会之后信息传播无孔不入，极其活跃，后来信息社会的发展使信息成为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权力，在最发达的美国，给美国带来空前繁荣的新经济就是以网络传播为主要动力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模式、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与此相适应，传播学也逐步发生了重大变革。西方传统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较为狭窄，从 60 年代开始传播学走出了传统领域，研究的领域十分开阔，重视传播与社会的互动反应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现象，很难考察传播学是一个学术自治的领域（陈卫星：《西方现代传播学术思想的回顾与展望》，1998 年）。传播学这种发展还有更广阔的学术背景，这就是二战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界线日益模糊的发展。19 世纪相信科学的精确，学术边界森严壁垒。这种状况在 19 世纪就受到过达尔文的科学批判和马克思、恩格斯、马赫的哲学批判。进入 20 世纪学科边界日益不清，学术进入综合性发展轨道。并向“复杂科学”发展。网络经济的出现使传播直接参与了经济发展，未来的传播学可能与经济学合流并广泛地直接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和道德重建，未来传播学将发展成为最大的显学，并日趋复杂和模糊，走向华勒斯坦所说的整体性研究道路，与此同时分析研究仍会发展，未来学术可能处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互动互补之中，形而上不大可能再像今天这样，被那么多人讥笑为“误导”的

“高深理论”。我在《绞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一文里提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离散——整合，在离散的基础上整合发展。学术应有同步的发展，在21世纪里，社会和学术将向离散——整合两极互动迅速发展。

《现代传播》这几年来所寻求的正是这个方向，它拓宽了研究领域，发展成为一家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学术刊物。与此同时，我们没有放弃过应用研究，但是在应用研究中我们尽力从操作层面向文化观念层面提升。我们相信，随时而进的先进观念虽然不能提供直接的操作本领，但是可以提供开启时代需要的创新大门的钥匙。当哥伦布的航船驶向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之后，社会便以类似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至今变革之快使人难于描述。从本质上讲变革就是创新。80年代中期以来，先是在发达国家后来在中国，创新一词充盈于报刊之上，而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国家创新体系，在迅速变革的世界里，业务理论和业务技巧一般都将迅速改变形态甚至过时，任何以当下实用为半径的教育和学术都将因为缺乏活力和后劲不足而陷入被动，只有创新能力才具有无限扩展的空间，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适应急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的需要，并使生命充满着张力，创新越来越成为生存发展的根本出路，创新就是多元文化要素的整合与升华，而这就必然要求开放。封闭，不可能引入多元文化要素并加以整合实现创新，创新变革在开放中诞生，美好的未来在开放中创造。

《现代传播》近几年的基本策略是在开放状态下多元共生整合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内容上，而且也体现在研究方法和文章体裁上。90年代中国学界经历了学术规范乃至学术道德的重建过程，至今没有完成。一方面胡乱堆积、肆意抄袭，学术

泡沫假冒伪劣泛滥成灾；一方面有人也指出，出现了强调规范过头现象（黄平、汪丁丁：《学术分科及其超越》，1998年）。我们根据对世界复杂性乃至混沌状态的认识，认为学术的基本规范是必须遵守的，但是任何研究方法和文章体裁都不具有唯一可行性，都不可以强调过分。我们有讲究学术规范的论文，也有访谈、随笔之类不太讲究规范的稿件。多种方法和体裁不仅有利于较全面地认识世界，而且可以使刊物生动、活泼、可读性较强。

我们的改革得到了大众传播界和学术界很多人的鼓励。1997年初刘敬东先生提议把《现代传播》发表的稿件结集出版。之后又得到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同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社长王克瑞、总编辑闵惠泉二位同志的支持，由于国内学界研究水平和我们办刊水平的局限，特别是我自己的局限，在办刊过程中我们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我们更为重视思想观念的研究和阐释，学问研究的系统性不足。我们对国际上传播学的最新发展有所反映但反映的不够。有关领域的研究有着大胆的重大选题，但也有着边际之虞。这是我们无奈的选择，也与我们的偏好有关。目前国内研究传播学的文丛并不多见，我们要求编入的稿件保持最初发展时的原貌，个别修改的都作了说明。但是在编辑方面还有很多不足，我们只是希望它能对中国传播学研究提供一些资料。我们已经看到，国内别的传播学学术刊物发了大量好稿，国内许多学者读了很多书，正在深化传播学研究，改革开放在不断发展，我们对未来寄予希望。我去年写了一篇论文论述了传播学将在21世纪发展成最大的显学，将与经济学合流，现在每天都会读到网络传播以及其他传播对于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的报道，传播

学具有灿烂的明天。我希望早一天看到中国传播学者所缔造的这个明天的到来。

(本序言草于1998年10月，以《无尽期的开放》为题发表于《现代传播》1998年第6期，在2000年春天本文丛付印之前作者作了少量修改)

目

录

1	走向开放	
	——《现代传播文丛》总序	/朱光烈
1	访著名电影导演吴贻弓	/吴贻弓 胡智锋
9	艺道·艺法·艺术家	
	——访音乐家、书法家曹建国	/曹建国 胡智锋
19	一个作家的生命体验	
	——史铁生访谈录	/史铁生 张 专
30	一个记者的文化求索	/麦天枢
40	1994秋天：我的生命体验	/朱光烈
59	戏剧就是归故乡	
	——林兆华访谈录	/林兆华 张 专
71	归来兮，我们！	
	——燕之《求索集》序	/朱光烈
75	走近神圣	/朱光烈

· 目
录 ·

- 77 中国学术未来辉煌的关键
——评《现代传播》第5期(1996)“主编札记” /段德智
- 81 也许“神圣”无需外求
——与主编商榷《走近神圣》 /王霞
- 83 心灵的真实纪录
——《最后的山神》创作谈 /孙曾田
- 91 说“味道”
——兼说电视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 /钟大年
- 99 当代传播的一个奇迹
——11位中青年学者纵论《泰坦尼克号》 /丁俊杰等
- 122 别样的滋味
——看《焦点时刻》 /李力
- 128 年终的文化话语 /朱光烈
- 134 关于“自由” /汪丁丁
- 142 思想与思想的条件
——《一种叙述：文化社会与文化范式》
 读后随想 /闻惠泉
- 146 批评，从我开始 /朱光烈
- 152 求通 /朱光烈
- 163 合理性：理性的伟大复兴 /祝南昌
- 167 学人与学问 /刘春
- 170 大学观念 /朱光烈
- 178 艺术家的空气
——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王志敏
- 184 雅不可耐 /何晓兵
- 194 我与学报随感 /刘敬东

198	请写短文	
	——《随笔》开头话	/朱光烈
200	打开窗户	/朱光烈
203	欢迎大家来讨论	/朱光烈
205	英雄依然辉煌	
	——《东方之子》观后感	/姜依文
213	十年寻路	
	——一份纯属个人的汇报	/朱光烈
243	我们有一次机遇吗?	/朱光烈
245	写在早春二月	/曲宗生
249	后记：感悟心灵之旅	/闵惠泉

访著名电影导演吴贻弓

吴贻弓 胡智锋

胡：吴先生，您的电影影响很大，能否请您将您的创作历程简单给我们的读者谈一谈。

吴：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1960年毕业后，进海燕电影制片厂作助理导演，跟随沈浮、郑君里等名家拍片。“文革”后一段时间与鲁韧、吴永刚等老艺术家合作。41岁才开始独立拍片，我的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响片是《我们的小花猫》等四本短片（1978年），1979—1980年间拍了《巴山夜雨》，1981—1982年间拍了《城南旧事》，1983年是《姐姐》，1984年《流亡大学》，1987年拍了《少年的磨难》，1990—1991年间拍了《月随人归》，1991—1992年刚刚完成《阙里人家》，还拍过一部电视剧《十八岁的男子汉》（1989年）。

胡：关于您的电影已有很多评论。我在给学生开设“影视剧文化”课时，曾从电影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把您的电影看作是80年代中国“诗化电影”的代表，与以谢晋为代表的“入

• 本文作者受本刊编辑部之托，于1992年5月21日在电影政府奖颁奖期间，采访了上海电影局局长、著名导演吴贻弓同志。此文系根据访谈纪录整理。应采访者要求，吴贻弓同志还为本刊作了如下的题辞：“祝愿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为影视教学和科研作出更大的成绩。”

“世电影”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电影的两种潮流，我以为这两大潮流分别是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史、乃至中国艺术文化发展史上两种潮流在当代的自然延伸。

吴：我没有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过专门探讨，你可以说我的电影是“诗化电影”，而我在拍摄这些影片时与其说是为了追求一种风格，还不如说是自我心灵的自然颤动及对它的表现，其实并没有刻意去为了追求什么或刻意地为了表现什么。

胡：您认为理论界、评论界对您的电影的评说是不是令人满意？

吴：理论界、评论界自有他们的标准，他们有他们的自由。不过有些影片在理论、批评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却为我自己所偏爱，如《姐姐》一片，外面反响一般，不论是从社会效益，还是在经济效益上都失败了，但我却始终对它格外偏爱。

胡：吴先生，很遗憾我没能看到这部影片，您能简单讲讲它的拍摄背景吗？

吴：这部影片写的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在临泽县（甘肃河西走廊）为掩护西路军西撤全军覆没后的一个故事。这段历史八一厂的《祁连山的回声》作了正面描写，而我的这部片子则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有三个人物，“姐姐”——一个红军女战士、小号兵、裕固族小姑娘。这三个人穿得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样在戈壁滩上走来走去。“姐姐”是负重伤昏迷过去的女战士，在寻找队伍的路上偶遇小号兵、裕固族小姑娘，他们遭遇敌人，姐姐和小号兵先后死了，只有那个小姑娘，从姐姐身上拿出姐姐视若生命的女兵连花名册，继续在戈壁滩上前行，淹没在风沙中……

胡：您是如何想到表现这样的题材的？

吴：本来我约叶楠（著名电影剧作家）一起到河西走廊，想搞一部农村片，结果到了河西走廊古长城脚下，到处可以看到刻在长城砖墙上的五角星，以及象征工农红军的“犁”字，听到了当地人们给我们讲起的很多关于西路军战士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写了这样一个东西。

胡：您说您偏爱这部电影，是指它的故事，它的人物，抑或是其它方面？

吴：我想主要是在艺术方面。我在这部影片中尝试着用新的电影语言来表达我的某种意念或情感、情绪。这就是将“声音”与“画面”进行交错、对立，如部队的嘻笑声，行军、上操、打仗的声音与其画面相交错、对立，按照声音与画面各自的思路双线展开。可是后来许多同志说看不懂，非要把行军、上操、打仗声音的画面补出来，打破了原来的构想，非常可惜。有些地方，如姐姐在刻着“犁”字的古长城下死去时，出现打仗的声音，这里“声音”与“画面”的交错、对立用得就很好。

《姐姐》里最使我满意的是那一场戏：三个人静静地望着太阳落山。不写日出，而写日落，我以为日落在某种意义上比日出更加壮观，更富一种苍凉、悲怆的意味。尤其是戈壁滩上的日落，可以清晰地看到太阳如何降至地平线的全过程，带着七色光彩，让你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命力和挣扎与强悍。音乐写得也极棒，交响乐气势磅礴。这场戏没有对话，三个人被这壮丽的日落所震慑，看呆了，最后只姐姐说了一句话：“明天还会升起来的。”

胡：可以想见，您的日落的境界太迷人了！我想，一个艺术家为什么要选择日落，而不是日出，是不是包含了他们对生命中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消亡所产生的一种留恋、惋惜的